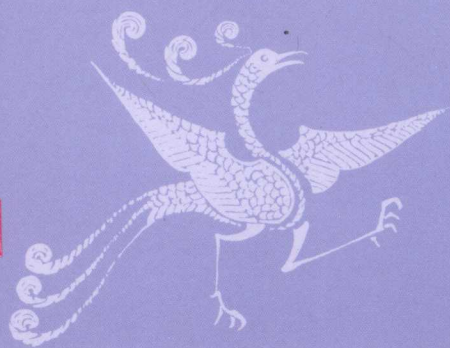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宋初百年文学复兴的历程



张
兴
武
著

本书以百年为限，重新探讨了宋初文坛渐至繁盛的复杂过程及内在轨迹，论述了“南文北进与北道南移”、“崑体”文学生态及创作主体的文化特征、“太学体”文风的成因和表现、欧阳修诗文革新的对象及任务等许多重大问题，考察了“文道之争”、“南北之争”、“古今之辨”等制约文学史程的内在因素，以及学术、科举、党争等可能影响文风走向的外在因素。以文献为基础，强调文、史、哲贯通的理论思辨与创新整合是本书特色之所在。

中 华 书 局

宋初百年文学复兴的历程

张兴武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初百年文学复兴的历程/张兴武著.—北京:中华书局,2009.5

(中华文史新刊)

ISBN 978-7-101-06527-5

I. 宋… II. 张… III. 文学史—研究—中国—961~1057 IV. I209.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3315 号

书 名 宋初百年文学复兴的历程

著 者 张兴武

丛 书 名 中华文史新刊

责任编辑 王传龙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30×960 毫米 1/16

印张 20¼ 插页 2 字数 300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6527-5

定 价 48.00 元

儒道实践精神启迪下的宋初 文学观照(代序)

韩经太

阅读张兴武教授新著《宋初百年文学复兴的历程》(以下简称《历程》),在感佩其为人勤奋而著述丰硕、治学严谨而考论审慎之余,不由联想到学界近年对陈寅恪先生治学心境的领悟:“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以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窃以为,兴武新著反复申说的“儒道实践精神”,在被确认为宋代文学复兴的内在精神支柱的意义上,想必与陈寅恪先生心目中“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华夏文化精神“通其意”吧!唯其如此,我又以为,《历程》本身亦可以视为儒道实践精神启迪下的“新宋学”探询。

中华民族自古好以“百年”为期而论事述史,这是否体现着华夏民族特有的大历史节奏感呢?比如兴武新著关于“宋初百年文学”的概念,就来自于欧阳修《苏氏文集序》中所流露出来的大体以百年为期的文章盛衰言说,在这个意义上,兴武之论颇有接着欧阳修来述说的意味,并以此而寓意丰满。“百年”之思,一般总是关乎大计的。所以,《历程》有关“文学复兴历程”的概念,就绝非人们一般理解所谓“宋初三体”时意识到的那样,仅仅视其为“宋调”确立之前的准备功夫。尽管欧阳修主要基于文章复古立论,尽管“古文始盛”与“文学复兴”两个概念之间尚有差异,但兴武教授的“百年”大判断因此而体现出透过局部现象来把握整体命脉的学术理路。再说,统揽丰富史料而分专题进行专门化的细密分析,进而又致力于提炼核心理念于系列专题之间,这本身就富于方法论的意义。

确认欧阳修开创有宋一代文风,自然是学界共识,欧阳修嘉祐二年权知贡举的革新成就,也早有学者为之申说,但此二者之间所涵涉的复杂现象,以及这些现象相互纠葛着所牵扯到的社会文化问题,仍

构成一个既深且广的学术探究的空间。兴武教授深入其间而作细密考察,通过文献细读和逻辑推导,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自然意味着对某些既定认识的反思,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程》的功夫并不仅仅在细密而精审。譬如,关于“文道传统得以修复的基本标志”问题,该书着眼于庆历前后范仲淹、欧阳修注重吏政的儒道实践精神,并特别阐发了“先策论后诗赋”这一科举新制的意义,可见其对“文道”的阐发,乃基于当时欧阳修倡导“文士”须关心“百事”这一要义而申论,富含“接着说”的意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其言下之“文道”便具有“文”“道”合一的特性,惟其就“文”“道”合一而讲“文道”,并且是以“儒道实践精神”为内在支撑,所以,其所谓“文”者也就不限于古文一系,亦惟其不囿于古文而立说,故而能正视宋初文章兴于骈体的事实。

《历程》提出“复合型主体”一说,整合务实致用的开拓精神、超越个人得失的体“道”意识、情理互通的人格魅力于一体,凸现出特定文化思想背景下文学主体自觉的特殊内涵,启人深思。就像当今读者不宜用现今的“文学”观去理解宋初的“文学复兴”一样,自然也不宜用现今的“文学主体”理念去衡量此间所谓“复合型主体”,否则,将难以理解“复合型主体”一说的特殊文化意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有关古今“文学”观念的辨析可以被忽略,而只是说,在我们一般性地达成中国古代文学整体上具有“泛文学”性这一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探讨应指向这种“泛”而不“纯”现象背后的文化精髓。恰恰在这一方面,《历程》一书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 and 阐述:“如果说‘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格自觉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道’性修养,显示着范、欧等人作为参政主体和学术主体的时代特性,那么《醉翁亭记》等名作对个性自由的张扬,则表明新的文学创作主体正在向生命和情感的真正回归。”我以为,此间概括出来的“参政主体”、“学术主体”和“创作主体”,再清晰不过地解析了所谓“复合型主体”的结构内容,而集此三者于一体的实践主体精神,不也正是宋代作为一个崇尚思理的时代所普遍讲求的核心课题吗?把握住此间奥秘,讲透了此中原理,就等于阐发了中国古代文学虽是“泛文学”而有其“主心骨”的文化底蕴。

“宋学”以及宋代文学的历史展开形态,无论对文学史界还是思想史界来说,都不是陌生的研究领域,先此而问世的论著堪称丰富,其间关键性的问题,更是世所瞩目。于是,凡《历程》创见所指,必与先见成商榷之势,此亦刘勰“有同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

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之义。于与旧说商榷处见新意,恰是兴武新著的特色之所在。欧阳修作为“复合型主体”的典型人物,其集参政、学术、创作于一体的重大实践行为之一,无疑正是嘉祐二年权知贡举事件,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遏制“太学体”问题。讨论宋初百年文学发展历程,不能不格外重视这一事件和相关问题。关键在于,真正显示研究深度的讨论,不仅需要提供前人未曾发掘的新材料,而且要基于这些新材料来展开更为全面、透彻的论证和解说。《历程》为此设立专章展开讨论,如果说其阐述欧阳修并不反对“西崑体”者,尚属学林渐有之共识,那么,其发掘新材料以证明“太学体”非属“古文”,论证庆历四年、嘉祐二年科考事案旨在优化“人才”标准,进而阐释欧阳修诗文革新乃以通古今之变、析文道之争、合南北文风为主要任务,就属于学术创见了。当然,其结论作为自洽之一家言,可期待学林同仁的评议。可喜的是,其论证本身,已然有启示于学界从容展开的进一步讨论,其所发掘的新材料,也为进一步的学术探讨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兴武教授研究五代宋初文学有年,著述颇丰,以文献功夫而兼思辩之长,有望大成。鉴于学界向来有能考据者每不善论辩,而善论辩者又难工考据之情形,这种兼攻考论的学术风格,尤其是以细密分析为基础而提升到价值判断层面,从而避免细碎化,更是值得倡导的。

新著问世,有益学林,先睹为快,有感而发,是为序。

时 2008 年初冬

目 录

引言 以问题为先导的艰难求索	1
第一章 百废待兴的文学环境	6
第一节 图书的搜集、整理、刊刻与编纂	7
第二节 宋初作家的地域分布	11
第三节 学校废兴与人才的培养	16
第二章 宋初文坛的冲突与对话	25
第一节 南北文臣政治地位的悬殊差异	25
第二节 科举取士过程中的重北抑南	30
第三节 南文北进与文坛风气的转移	37
第四节 北道南移与儒学精神的回归	45
第三章 文道传统的缺失与修复	52
第一节 儒道衰替与宋初经学家的艰难探索	53
第二节 文学创作走出乱世阴影的漫长历程	60
第三节 文道传统得以修复的基本标志	68
第四章 文学变革的人格及情感动因	75
第一节 创作主体人格内涵的丰富与扩大	75
第二节 “文士”情怀的传承与超越	82
第三节 “复合型主体”的价值判断及情感境界	88
附论 《庆历圣德诗》与北宋中期政治文化的转型	95
第五章 示范性经典的更替与宋初文学之转型	109
第一节 诗效“元白”：“次韵相酬”的艺术需求	109

第二节	宗尚玉溪:风雅遽变的艺术契机	112
第三节	“《文选》烂”而“秀才半”	115
第四节	“韩、柳”承尊与诗文艺术之转型	117
第五节	“杜诗”经典价值的最终确立	120
第六章 溪流灌注,百川归海		
	——宋初诗歌发展三个阶段的艺术考察	125
第一节	五代遗音及王禹偁诗歌艺术的超越	126
第二节	重学之风与“崑体诗”的兴盛	142
第三节	“欧梅”新声再变风雅的艺术功绩	158
第七章 “崑体”文学生态及其创作主体的文化特征		
第一节	皇权重建过程中的赋颂需求	175
第二节	南方士人以文学为进身之阶的必然选择	176
第三节	望族文化心理的成熟与“西崑余绪”	181
第八章 骈散并驰,文质兼修		
	——宋初文章由衰到盛的艺术演进轨迹	188
第一节	北宋文章初兴于骈体	195
第二节	道学家的“古文”理论与创作实践	195
第三节	“古文”艺术的继承与超越	210
第九章 北宋“太学体”文风新论		
第一节	“太学体”并非“古文”	237
第二节	“太学体”应试文风的形成与蔓延	237
第三节	“庆历之学”与“太学新体”	243
第十章 欧阳修诗文革新的对象及任务		
第一节	欧、梅不与“西崑”为敌	255
第二节	科考改革并非革新诗文之手段	255
第三节	欧阳修诗文革新的对象及任务	260
第十一章 宋初隐君的人格变迁与诗风走向		
第一节	世风与隐风	265
		277

第二节 经义之学与文章之士	285
第三节 隐逸诗风的南北差异	294
征引书目	304

引言

以问题为先导的艰难求索

两宋文学研究向来是名家辈出而成果丰硕,举凡诗词文赋及序传碑铭诸体制,因袭守旧与创变革新诸思潮,前贤所论多有不可逾越者;北宋一段尤其如此。然而,学术探索无止境,其犹浩淼之江波,昼夜摧激而摇荡东流,魅力在此,激情也在此。窃以为一代有一代之学术,而波澜所系,唯在于置疑与求证之精彩过程而已。本书所以要对宋初文学研究的许多既有结论提出新的疑问,首先是由一种自五代十国而下探宋初百年的学术视角所使然;所谓源流正变的历史轨迹,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逆推而毕见的。本书以问题意识为先导的求索过程,或许还存在不少的疏漏和不足,但从原始文献出发进行创新思考的学术信念却始终虔诚。所述或有一孔之见、一偏之得,亦渴望能与学界友朋切磨以共乐也。然而,当这本并不深奥的学术著作呈现于读者面前时,并不是所有感兴趣的人都有充足时间进行通读。为了克服类似的困惑,特将本书要点简述于次。

一 有关研究时限

本书的研究时限,上起建隆元年(960),下到嘉祐二年(1057)。“宋初百年”的提法源自欧阳修《苏氏文集序》,其文称:“予尝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几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余习。后百有余年,韩、李之徒出,然后元和之文始复于古。唐衰兵乱,又百余年而圣宋兴;天下一定,晏然无事,又几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严格说来,仁宗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借权知贡举之机,将曾巩、苏轼、苏辙、程颢、朱光庭、张载、吕大钧等一批文学才俊选拔入仕的历史事件,意味着自北宋建国以来融合南北文风、修复文道传统的努力终告完成,而“宋学”之关学、洛学、蜀学及新学四大流派的繁盛也肇端

于此。此次贡举的主要任务虽不是变革文风,但它无意间却成了宋初文学复兴过程的终点;宋元文人所谓“文体自是一变,渐复古雅”(刘埙《隐居通议》卷一三引《半山总评》),即包含着同样明确的判断。本书稿以此为由,将研究下限确定在嘉祐二年。

二 三个阶段、三位领袖和三个基本矛盾

我们以为,宋初文学的复兴是在五代乱后的废墟上进行的,百年文坛探索前行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由王禹偁主盟的太祖和太宗时代,由杨亿为文宗的真宗时代,以及欧阳修领导诗文革新的仁宗时代。各阶段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虽有所不同,但求变求新的总体方向却始终如一。宋初文坛面临的基本矛盾有三:一是“古今之辩”,二为“文道之争”,三是“南北之争”。随着这些矛盾的逐步化解,文学创作由衰转盛的过程也渐告完成。

三 用力创新之处

为了分析和阐述百年文学低谷渐进、变革创新的历史进程,我们运用“生态分析”方法,侧重对创作主体特性演变的考察。为了凸显“问题”意识,本书选择专题讨论的方式,多角度考察了皇权政治、科举制度、学术思潮、朋党斗争等时代因素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复杂“关系”,深入分析了诗文艺术传承与创新的内在轨迹,反思并修正了一些几近成说的学术观点。其创新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客观具体地考察北宋建国之初的文学发展基础,包括图书的搜集、整理、刊刻与编纂,作家的地域分布及南重北轻的文学发展格局,以及学校教育和人才培养的真实情况;并明确揭示出宋初三朝南北文臣政治地位的悬殊差异,以及科举取士过程中存在的重北抑南现象。在此基础上,进而讨论“南文北进”与“北道南移”的历史过程,以及该过程对转变文坛风气、重振儒学精神所产生的现实影响。简而言之,北宋统一之初的文坛呈现着南重北轻的格局,南北文化及文学传统的交汇与融合,使传统儒学最终实现了与南方文化的有机结合,其深厚博大的人世精神又得以回归,北宋文化繁荣的曙光也随之悄然升起。

其二,深入讨论文道传统的缺失与修复。宋初百年文道传统的重

建经历了从缺失走向修复的漫长过程,该过程既与皇权政治的重建同步,又面临着唐末五代以来文道久丧的惯性困扰。天圣以前,“道学之儒”和“文章之士”在“复道”和“兴文”两个方面分别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和积累。庆历以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将“复古明道”与修身、行事、立言结合起来,倡导以“道义之乐”为核心的文学理念,终于取得了文道传统全面复兴的辉煌成就。虽说宋初文化探索很难被纳入“宋学”研究的范畴,但如果没有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杨亿等人前赴后继的努力,就不会有范、欧、苏、梅承前启后的建树;而没有范、欧诸公对儒道实践精神的空前张扬以及欧阳修以重释《诗经》为先导的经学探索,苏轼及王安石等以“革新政令”和“创通经义”为核心精神的“宋学”新建,同样会缺乏文化传统的有力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欧阳修不仅是宋初文道传统修复历程的终结者,也是“宋学”启蒙的先驱。

其三,进一步阐述宋初百年文学变革的人格及情感动因。宋初四朝制约文学变革的内在因素固然很多,但基本动因首先来自创作主体人格内涵的丰富与扩大。柳开、王禹偁及杨亿等“文士”群体从文学遗产中汲取艺术情感和审美经验,为逐步摆脱五代遗风的困扰提供了有效手段;与此同时,他们超越前贤的每一次努力,都为文学自身的变革与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仁宗“庆历”前后,随着士大夫“复合性”主体特性的基本成熟,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新一代作家,不仅为“天下”、“国家”、“道”等传统理念赋予了新的人格内涵,更为文学作品展示人性人情的多元色彩进行了实践和示范。王禹偁、杨亿及欧阳修三人不仅是引领风骚的文坛领袖,更是当代作家主体特性及情感结构演变发展的阶段性标志。

其四,具体分析示范性经典的更替与宋初文学转型之关系。宋初百年是唐、宋两代文学递变转型的关键期,文学经典的阶段性更替则从一侧面展示出文学转型的内在轨迹。就诗歌而言,建国之初,众多文人为了满足“次韵相酬”的时尚需求而效法“元白”,“崇白”之风盛行达三十余年。真宗一代,“西崑体”作家追寻李义山风采,致使诗歌经典悄然转换。仁宗以后,韩愈和杜甫的作品相继受到追捧,成为新的艺术经典。韩、杜两家在诗歌创作上各具风采,而北宋诗人兼收并取,熔铸锻炼,最终形成了“宋诗”有别于“唐诗”的创作理念和品质追求。文章方面,宋初文人在科考的压逼下,为了掌握骈文写作的种种技巧而苦读《文选》,从而为《文选》赋予了经典价值。天圣以后,随着

“古文”运动的逐步开展,《文选》的经典示范作用逐步消减,而“韩、柳”散文的影响却越来越重。如果说仁宗时代是北宋文学脱胎换骨的转型期,那么韩愈、杜甫的诗歌以及“韩、柳”的散文,无疑为此次诗文转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示范和启迪。

其五,反思“宋初三体”之说,超越“轻骈重散”的文章价值理念,重新考察宋初诗歌艺术和文章艺术发展演变的整体轨迹,是本书最为用力的部分。就诗歌而言,王禹偁等人以其兼收并蓄的探索与实践,初步摆脱了以“浅俗”和“苦吟”为表征的“五代遗音”的困扰;以杨亿为代表的南方才子,以繁辞丽藻展示着博学雅逸的气质,将诗歌艺术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如果说宋初三朝的诗歌创作还呈现着“溪流灌注”的态势;那么,随着“欧、梅”诸公博采众长、再变风雅的卓越创造,北宋诗坛已显示出“百川归海”的气势。再就文章来看,我们首先明确强调“北宋文章初兴于骈体”的客观事实。而在“古文”艺术方面,虽说“道学之儒”和“文章之士”各有偏擅,但柳开、穆修、孙复、李觏、石介等人重在言道,其艺术水平很难与王禹偁、尹洙、苏舜钦及欧阳修等人相提并论。此外,隐逸作家的人格追求、价值判断、学术研究及诗文创作等均不宜与仕宦阶层相混淆,故专列一章,别作讨论。

其六,考订和辩正已有的研究结论。本书重新考察了“宋初三体”、“西崑体”、“太学体”以及欧阳修“诗文革新”的对象和任务等重要问题,并对此作出了新的理解和阐释。譬如,现有文学史论著普遍将“西崑体”诗文看作歌功颂德的形式主义作品,否定其时代意义和艺术价值。笔者认为,宋初几朝南、北方文人政治待遇的悬殊差异,南方士人以文学为进身之阶的无奈选择,以及赵宋政权对“激扬颂声”的政治需求,共同造就了“崑体”文学以赋颂为主的价值取向;南方作家博学多才的文化优势与宋初诗坛酬唱风气的结合,为“崑体”文学审美特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南方士人群体社会政治地位的提升,“崑体”文学的创作主体已由原来的翰苑侍臣转变为朝廷重臣,人生体验与艺术表达都充满了富贵气;这种富贵气既是“崑体”文学与生俱来的文化品质,更是北宋中期以后逐步成熟起来的望族文化心理在诗文创作中的必然反映。再如,近代学者普遍认为,“西崑体”和“太学体”是欧阳修“诗文革新”的主要对象,而由欧阳修主导或亲自主持的两次科举考试改革,乃是此次“运动”的重要步骤。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乃是“运动”思维的结果,实际上,欧阳修从来就不曾反对杨亿或“西崑体”诗文,而所谓“太学体”也不过是流行于学校及科场之间的一种应

试“时文”，它既非“古文”，更难成为欧阳修诗文革新的主要对象。至于庆历四年和嘉祐二年发生的两次科考事案，其核心目的是优化为国取士的“人才”标准，而不是变革文风。欧阳修诗文革新的基本任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融通古今之变，辨析文道之争，整合南北文风。欧阳修、尹洙、梅尧臣及苏舜钦等人超越时流的创作成就，为此次诗文革新大获全胜提供了根本保证。

浏览上述要点，对了解本书之创获与得失当有所帮助。孔子尝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簣，进，吾往也。”学术探索的苦乐与得失，视此而已。也许方回等人持之甚坚的“宋初三体”之说并不完全是脱离诗歌发展实际的生搬硬套，也许北宋文章初兴于骈体的观点还有待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也许“西崑体”诗文的盛行原因和艺术价值并不像我们所分析的那样简单，也许对欧阳修诗文革新的对象和任务还须作更为深入的讨论。情知学无止境而求索不已，簣土之功应不可没；渴望超越传统而有所创获，小流之积亦足珍惜。探索未知乃是一段值得享受的过程，求索之乐自在其中。相信明天还会有更多圣贤来释疑解惑，对此谨奉上无比真诚的期待。

第一章 百废待兴的文学环境

结束了晚唐五代一百余年的分裂震荡之后,北宋政权的建立终于使衰残已久的文学殿苑获得了重建和复苏的机会。不过,正如“致治几乎三王之盛”^①的唐初政权不能不面对诗衰文残的局面一样,宋初几朝的文化及文学重建也只能在五代十国“乌睹风雅”^②的颓败基础上艰难进行。宋初文人步履蹒跚的探索虽然少了几分浪漫与洒脱,但他们在乱后废墟上辛勤耕耘的身影同样值得瞩目。

自唐懿宗咸通以后,华夏大地久罹战祸摧残;黄巢之乱殃及大江南北,强藩称雄祸及长城内外,战火硝烟中杀戮和死亡的消息不绝于耳,所有与文化有关的人和事都令人悲哀。五代则更是“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毁,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③。其时武夫悍将骄横称雄,以为“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④,因而篡弑相寻,肆无忌惮。文人士大夫生于其时,非但不能兴国安邦,动辄还有性命之忧。即使显达如冯道“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者^⑤,也不免仰人鼻息,视人眼色。与此同时,李唐时期积累起来的大量图籍也在长安、洛阳的劫难中丧失殆尽,华夏文化的基础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和摧残。

北宋建国伊始,面对的便是这样一种近似丘墟的文化基础。宋初帝王在动用武力平定宇内的同时,也在着意寻找文化重建的有效途径。太祖建隆四年平定荆南、湖南,乾德三年攻灭后蜀,开宝四年讨平

①《苏氏文集序》,《欧阳修全集》卷四三,中华书局,2001年,614页。

②牛运震《五代诗话序》,丛书集成本《五代诗话》卷首。

③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一七《晋家人传》,中华书局,1974年,188页。

④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九七《安重荣传》,中华书局,1976年,1302页。

⑤司马光评语,《资治通鉴》卷二九一,中华书局,1956年,9512页。

南汉,开宝八年李煜归降,太宗太平兴国三年钱俶、陈洪进纳土归朝;随着国家统一事业的完成,原来分散在南方各地的图籍资料被搜集转运到首都汴梁,而数以百计的文学才俊也从全国各地汇聚到一起;经晚唐五代长期积淀起来的南方多元文化,遂由此得到强有力的整合,而宋初文化得以复兴的基础条件也开始形成。不过,严格说来,那些久经乱离而仓皇入宋的文人们,无论其对待新朝的态度如何,都无法从根本上满足新政权文化建设的迫切需求,而更多新人才的培养还要有赖于以“四大书院”为代表的“乡党之学”及各类私塾的不断努力。因此,在全面分析北宋文学复兴的艰难历程之前,对宋初图书、人才及学校教育等基础条件略事考察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节 图书的搜集、整理、刊刻与编纂

图籍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和象征,在五代乱世遭受了毁灭性的摧残,其如顾懷三《补五代史艺文志序》所云:“唐末大乱,干戈相寻,海寓鼎沸,斯民不复见诗书礼乐之化,而桥门壁水,鞠为茂草。一时称王称帝者,狗偷鼠窃,负乘致戎,何暇驰驱艺文之林,揽轡道德之府,彬彬郁郁,久道化成乎。盖图书之厄,至此极矣!”^①在北宋建国以后的数十年间,图书匮乏的情况始终制约着文化重建的进程。真宗时期身为国子祭酒的邢昺就明确说到:“臣少时业儒,观学徒能具经疏者百无一二,盖传写不给。”^②时隔多年之后,苏轼还回忆说:“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③在此状况下,图籍的搜讨和整理,就成了宋初文化重建过程的首务。从太祖建国到真宗一代,为解决这一基础难题而进行的努力也一直没有间断过。

据《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一五载:“太祖乾德元年平荆南,诏有司尽收高氏图籍以实三馆。国初,三馆书裁数柜,计万三千余

①顾懷三《补五代史艺文志》卷首,丛书集成本。

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作《长编》)卷六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页516上。

③《李氏山房藏书记》,《苏轼文集》卷一一,中华书局,1986年,359页。

卷。”^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七载,后蜀灭国之后,宋太祖“遣右拾遗孙逢吉至成都,收伪蜀图书法物”,“逢吉还,所上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毁;图书付史馆”。同书卷一七载,金陵城将破,太祖先已“令太子洗马河东吕龟祥诣金陵,籍李煜所藏图书,送阙下”;卷一九太平兴国三年正月下复云:“建隆初,三馆所藏书仅一万二千余卷,及平诸国,收其图籍,惟蜀、江南最多。凡得蜀书一万三千卷,江南书二万余卷。又下诏开献书之路,于是天下书复集三馆。”在搜集所得的所有图书中,来自南唐的图书和画卷最为精致。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〇《江南书籍》条引《杨文公谈苑》称:“王师平金陵,得书十余万卷,分配三馆及学士舍人院,其书多雠校精审当,编帙全具,与诸国书不类。”同书卷五〇《太祖赐翰林院书画》条继称:“太祖平江南,赐本院书三千卷,皆纸札精妙,多先唐旧书,亦有是徐锴手校者。其后散失过半,惟演再入院,编排得千余卷而不成部帙,其《九经》、三《史》、《三国志》、《晋书》,即是晁迥、李宗谔在院时奏请其书印署部帙。”又云:“太祖平江南,所得图画,赐本院,初有五十余轴,及景德、咸平中,只有《雨村牧牛图》三轴,无名《寒芦野鸭》三轴,徐熙笔;《五王饮酪图》二轴,周文举笔;亦令重装背焉。”以上所述图籍还仅限于归入三馆的部分,收藏在其它地方或者散落于显宦之家者,应该还有不少。譬如梅尧臣就曾谈及闽中上元县之澄心堂藏有李煜数千幅法帖。《宛陵先生集》卷二七《答宋学士次道寄澄心堂纸百幅》称:“寒溪浸楮春夜月,敲冰举帘匀割脂。焙干坚滑若铺玉,一幅百钱曾不疑。江南老人有在者,为予尝说江南时。李主用以藏秘府,外人取次不得窥。城破犹存数千幅,致入本朝谁谓奇。漫堆闲屋任尘土,七十年来人不知。”《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卷一一《升元贴》条称:“《闲者轩帖》考云:南唐李后主出秘府珍藏刻帖四卷,每卷后刻升元二年三月建业文房模勒上石,为淳化阁帖之祖。”清顾樵三《补五代史艺文志序》亦云:“赵元考家藏有澄心堂书三千卷,上有‘建业文房’之印。”此外,《宋史》卷三一七《钱惟演传》称惟演“家储文侔秘府”;同书卷四八〇《钱惟治传》亦云:“惟治好学,聚图书万余卷,多异本。”钱俶子侄所藏书籍,多数应系吴越国旧物。

除了尽取南方各国图书充实三馆外,宋初政府指派专门人员去诸

^①徐松《宋会要辑稿》第三册,中华书局,1957年,页2237下。